

婚姻平權與酷兒解放的未來

Kenyon Farrow 主講（20160604）

葉德宣、丁乃非翻譯，何春蕤校訂騰稿

黃道明（主持）

歡迎大家參與中央性／別研究室今年第五個系列演講。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Kenyon Farrow來主講，Kenyon是美國備受推崇的社運份子和作家，過去15年來他組織過大大小小的社運連線，層級的規模從地方、全國、到全球，經驗與經歷都非常豐富。在種族壓迫下，黑人日常生活就在行政司法下被選擇性的暴力對待，特別是大約2012年開始，美國發生多起警方執法濫權殺害黑人的案件，這引發了黑人社群的串連抗爭，形成晚近席卷美國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我們把它翻成「黑命關天」運動，Kenyon就是這個全國運動的領袖之一。上周他在中央大學以〈黑命關天：黑人正義運動的歷史源流〉為題目，從他個人家族成員1960、70年代參與美國黑豹黨發起的黑人社群自衛、自我教育、自我照顧的社區動員講起，追溯15世紀到19世紀跨大西洋的黑奴販賣如何構成現代性的重要歷史成份，以及這段歷史如何延續到美國後種族時代監獄複合體（the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的興起。他提醒在場聽眾如何面對美國國家資本社會以大規模犯罪化和監禁的手段來處理種族跟階級矛盾，演講非常精彩。

Kenyon過去曾經擔任紐約「酷兒追求經濟正義」（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組織的執行長，之前來訪過的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也曾是這個組織的執行長，現在這個組織已經消逝，因為募不到經費，部份原因就是同婚議題吸走了所有的捐款。Kenyon過去致力組織對抗，比如說，紐約市在仕紳化過程中對有色人種青少年入罪化，2008年Kenyon曾經發起掙脫枷鎖計畫（Project Unshackle），首度串聯愛滋運動者與監獄改革的行動者，推動愛滋的除罪化，也爭取未成年人在尋求HIV治療照護的時候還能保有隱私權與居

住權。在酷兒經濟組織任職的這段期間，Kenyon也努力串聯美國LGBT草根組織，強化這些組織介入經濟和種族正義議題的能力，並在一片白人主導的同婚運動之中，以酷兒經濟組織署名，起草發出一篇叫做〈超越婚姻〉的重要聲明，表達了左翼的酷兒觀點。

Kenyon現在是愛滋治療行動組織裡美國及全球健康政策部門主任。我要說一下這個組織，大家可能聽過美國愛滋運動有一個叫ACT UP的組織，它1992年之後分裂，有一部份人專注在搞愛滋治療，像是一個獨立的智庫團體，Kenyon的新工作就聚焦於愛滋的防治，想把愛滋防治和改變社會結構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現在愛滋運動都是單一議題走向，他則希望做一個橋樑，把治療防治的問題和改變社會結構的運動結合在一起。我覺得蠻重要的是，他也在工作中納入了肺結核防治，因為肺結核是跟貧窮交結在一起的，現下公衛處理肺結核的方式是很違反人權的，用愛滋運動者的標準檢視來看，就知道是很不可思議的粗暴對待，Kenyon在這方面的工作顯示他的視野是非常有階級與種族眼界的。

Kenyon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會寫的作者，他是《青年行動者快報》這本書的主編之一，文章散見於各種文集和報章雜誌網路中，對婚姻平權、愛滋議題、美國種族主義、美國軍國主義、和美國同運的各種議題都有非常犀利的見解。如果各位看過《苦勞網》上面我們先發的那三篇翻譯文章，我覺得Kenyon分析流行文化再現政治的功力很高，非常脈絡化、具體地去看這些形式的壓迫，也因為這樣，他的作品很受到美國學院的重視，所以曾經受邀去很多美國著名大學做會議的主題演講。

今天Kenyon的演講主題是〈超越平等、婚姻平權、與酷兒的解放未來〉，他會深入反省婚姻平權主張的侷限，並從處理多重交織壓迫的酷兒左翼解放路線放眼未來。我們今天同樣也很榮幸請到TG蝶園的高旭寬作為Kenyon的回應人，旭寬的發言大家應該都不陌生，思考清晰、尖銳給力，每次讀都會覺得很爽，所以今天很期待他以跨性別的角度來回應同婚的議題。台上兩位幫忙翻譯的都是中央性／別的老師，葉德宣會把Kenyon講的翻成中文，丁乃非則把你們講的中文翻成英文給Kenyon聽。現在把時間交給Kenyon。

Kenyon (葉德宣翻譯)

感謝大家願意在盛夏期間從四面八方趕到這個會場來聽講。今天主要想談的是過去10年美國和全球發生的一些事情和趨勢，以及它們對同志運動整體所可能產生的衝擊和挑戰。

一般人認為美國LGBT運動是從1969年石牆酒吧暴動事件開始，很多史家也都是以這個時間起算，不過實際上，當時其他地區也有很多不同的事件在發生，許多團體都在各級政府和其他領域裡尋求同性戀的除罪化。石牆暴動主要是因為警察暴力對待LGBT群體而起，但是那個年代大部分參與LGBT運動的群眾都同時也參與其他社會運動，例如反核擴散、反軍國主義、黑人解放、西裔解放、婦女解放，或其他解放運動，所以事件發生後，紐約市警察和聯邦調查局曾以為石牆暴動是黑豹黨和兩個左翼激進組織在背後支撐的。我指出這一點，是想要說明LGBT運動的基礎是很激進的，也被政府視為和其他非常激進的運動或組織相關。

問題是：本來這個有著激進源頭而且曾經被美國政府視為「頭號人民公敵」的運動，是怎麼發展成今日以很保守而屈就的立場來訴求「平權」的組織的？

我認為答案很簡單，就是1980年代席捲美國的愛滋風潮。那時，愛滋傳染病因為造成大量男同性戀死亡而進入大眾意識，許多本來和LGBT運動毫無關連但是有資源、有錢、主要是白種的男同性戀，開始積極把金錢和資源投入會衝擊到他們的議題，其中包括愛滋議題，也包括政治訴求反映他們價值觀的其他組織，有些男同志死於愛滋後，把所有個人財產都捐給1980年代出現的主流同性戀組織，促成它們的快速成長。

1992年柯林頓首度競選總統，他在尋求同性戀選民支持時允諾會改變聯邦法律，讓同性戀可以加入軍旅，這可以說是今日以「平權」為主要訴求的同性戀運動出現的第一個時間點。從此，LGBT運動開始繞著這些主流化的議題進行組織動員，主要議題包括：第一，剛剛提到的同志從軍權，第二，現在流行的同志婚姻權，第三就是保護特定人群不會因為種族、性別、宗教、原生國而受到歧視的仇恨犯罪立法，同志團體希望性傾向、性別認同也被包含進去。第四個就是性傾向平等居住權，也就是希望同志在租屋或就業

或其他公共空間使用上不受歧視。

目前在美國，主流的平權訴求幾乎已經完全實現了。首先，在歐巴馬總統任內，男女同志進入軍旅已經不受限制，其次，聯邦的反仇恨犯罪立法已經通過把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包含在內，第三，去年美國最高法院已經承認同性婚姻平權。接下來，我想要談的就是在這些主要的聯邦政策變化後的發展。到底有哪些事情變了？哪些事情正在發生？這些發展不是只在美國，我知道有些發展其實是在全球進行的。

剛才我說到平權訴求得到實現的四個領域，但是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卻被遺落在一旁，那就是就業歧視。反就業歧視立法本來是要保護LGBT人群不至於因為自己的性傾向而被辭退工作或者遭遇住居歧視等等，但是因為這個立法一直沒有完成，現在我們看到的反而是基督教右派組織的積極行動。他們在美國各州提出所謂「宗教豁免法」，有了這個法，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以自己的宗教信仰立場來進行歧視的行為。比方說，如果一對同志伴侶來我的糕餅店訂製結婚蛋糕，我就可以因為自己的宗教立場而拒絕提供服務。

美國的LGBT運動在倡議婚姻平權的時候已經犯過很多錯誤，現在卻仍然繼續犯同樣的錯誤。要知道，這種宗教豁免法一旦成立，它們涵蓋的範圍將遠超過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可以在包括種族、宗教等等基礎上向任何它者拒絕提供服務。也就是說，這種立法實際上對全國人民都有深遠的衝擊，但是LGBT運動卻沒有用牽涉到其他人群的議題角度來串連更多群眾廣泛思考立法，只以單一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角度來抵抗這些立法。結果，是誰最有力、最有效的抵抗了這些立法呢？其實是大企業。在各州嘗試要設置宗教豁免法的時刻，這些大企業最有效的提出反對，它們要不就抵制立法，要不就威脅要把企業總部撤走，或者把那些為州政府賺很多錢的活動撤走，以此對州議會施壓，阻止成法。例如去年北卡羅來納州要推動這種宗教豁免法，結果全國足球聯盟就威脅要改變2017年超級杯將在北卡夏洛城舉辦的決定，最終迫使北卡州州長否決議會通過的立法。

看起來我們好像得感謝這些跨國企業在LGBT議題上站了我們的立場，但是這麼一來，我們就失去立場質疑這些跨國企業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所造成的環境破壞，也失去立場批判跨國企業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所進行的勞動剝削。就因為它們挑戰了宗教豁免法，好像對同志很友善，我們就失去

了所有批判它們的立場。這就是只用同志平權來想事情的惡果之一。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LGBT平權運動在美國的發展如何對全球產生衝擊。

首先，美國有許多募款捐款支持LGBT議題的基金會，一旦發現同婚大概一兩年內就能通過立法時，就決定把資金和資源移到美國之外去幫助別的國家的LGBT人口爭取和美國同志一樣的權益和法律。捐款的焦點很明顯的集中到非洲、中東、加勒比海、以及東歐的前蘇聯國家，其中著力很深的就是非洲南部的國家。我在非洲南部各國認識很多同運份子都說，這種資金的遷移已經在本地運動圈造成嚴重衝擊。

因為美國的出資者或NGO會要求資金的使用由他們主導，本地的組織工作因此都必須追隨美國同志平權運動運作的模式。例如，奈及利亞的同運組織依著本地現實會與其他社運組織結盟推動立法，像是對抗身體暴力的社運組織（奈及利亞推動婦女權益或生殖權益的組織）或是批判政府腐敗的運動組織，大家一起串連結盟。在起草法案時LGBT性少數組織也會與其他社運組織同步前進，可是美國的出資者卻告訴在地的同運組織說，這些議題（身體暴力或政府腐敗）不是他們要的議題，在地組織應該專注於讓奈及利亞政府通過反歧視和同婚的立法。然而在非洲南部的生活現實裡，孤立的推動同志議題不但在政治上很危險，對運動份子的人身安全而言也很危險，可是出資者還是強迫在地組織要往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就是，美國的LGBT組織在上述國家推動LGBT權益立法，同時以美國為基地的基督教右派組織也在這些同樣的國家裡推動反LGBT立法。結果搞得當地人民在自己國家裡都弄不清楚什麼才是最好的策略來推動比較激進進步的議題，但是卻時時受到美國政治光譜兩頭的拉扯。像奈及利亞、肯亞或烏干達這些國家，本來就有不同的宗教教派在爭奪政權，例如奈及利亞南部主要是歐洲族群、基督教為本的區域，但是北部則是伊斯蘭為主的族群區域。當美國來的資金和組織大量投入在地的LGBT議題時，在地的政治人物反而有藉口要抗拒外力介入，因而串連起各種不同宗教的反同恐同情結，透過建立反LGBT的立法來鞏固腐敗的政權。

最後，我認為這些現象的出現，顯示全球資本正在各個國家的大城市裡創造同質性很高的場域，好讓那些富裕的人可以在城市和國家之間遊走而不感覺到區別。這種框架把LGBT運動放在一個非常狹隘的「平權」概念裡，

當作21世紀自由民主社會和它們的都會城市定義自我的標準，而現在我們觀察到的各種變化，正是不同國家爭先擁抱這個模範、或者對它做出抗拒的反應。我覺得這些事情也直接相關我們所觀察到的城市仕紳化、財產和土地轉移、以及資本在全球城市裡的重組。這些因素都使得全球各地的文化更加同質化，而LGBT平權架構正是這個新自由主義全球計畫的一環。

黃道明：謝謝Kenyon和德宜的翻譯，接下來請高旭寬為我們做回應。

高旭寬

Kenyon從美國黑人的角度來談同婚運動，我被期待從跨性別的角度來談婚姻平權，以下就簡稱「同婚」。在台灣，同婚的意義幾乎已經等同於「尊重性少數」。去年我有一個家境優渥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跨性別朋友叫我一定要支持同志婚姻，他說他的教會朋友表達反對同婚的立場，讓他這輩子第一次覺得被嚴重歧視（聽眾大笑）。反同婚就是反對LGBT的平等人權，不過我比較驚訝的是，他竟然到現在才感覺被歧視，可見性少數的命運真的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同婚運動席捲了大部分性別運動的能量與能見度，嚴然成為對抗保守宗教勢力的基地，然而，世界各地都有運動組織開始反省國際串連的同婚運動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Kenyon從黑人的角度談美國的同婚運動，那我今天就試著從跨性別的角度來談「為什麼我們不把同婚當成運動優先爭取的目標」。

其實「台灣TG蝶園」以前參與過多元成家修法的籌備會議，但開會幾次之後就決定退出，原因是覺得跨性別在伴侶關係上遇到的問題並不是「沒有結婚權」，因此對於結婚權無感，當然也就累積不了運動動能。那跨性別在伴侶關係上會遇到什麼問題呢？2016年2月上映了一部很轟動的電影「丹麥女孩」，主角是知名的繪畫大師埃恩納，跟妻子葛蕾塔結婚之後有一次為了當模特兒穿上女裝，開啟了他壓抑多年的「當女人」的慾望。埃恩納越是女性化、越往女性角色發展，他跟葛蕾塔在情慾和伴侶形象上的期待就落差越大，關係也越來越緊張。

好，我們回到觀眾的位置上。我發覺很多人看完電影之後投射最多情感的是主角的太太葛蕾塔，大家覺得她雖然很痛苦，但卻能夠用無比的真愛接

納丈夫變性，實屬難得。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會想，我們之所以覺得葛蕾塔對丈夫的愛特別難能可貴，很可能是因為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掙扎，就像母愛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媽媽像蠟燭一樣燃燒自己無私的奉獻，對吧？那麼我們歌頌真愛、渴望真愛的背後又透露出我們準備用什麼態度來面對伴侶跨越性別所產生的各種矛盾衝突呢？

仔細觀察過去台灣媒體上爆發的跨性別事件，不難發現，無論是閱聽大眾或相關人士，多半會指責跨性別者在伴侶關係中欺騙對方、不負責任、誤人一生，很像大陸現在在吵的「同妻」議題。台灣的法律並沒有強迫已婚的跨性別者在變性之後必須解除婚姻關係，但我們社群裡還是有很多人跟配偶走不下去，得協商離婚。2015年台中一中的曾老師變性，受到全校師生的支持，並且在蔡依林的演唱會上掀起台灣性別友善的高潮。蔡依林前段時間大量使用婚姻平權當作表演題材，邀請曾老師出席的那場演唱會主題正好就是「不一樣又怎樣」，提倡尊重多元、接納差異，要求婚姻平權。但是，在其他的談話性節目裡，十分受到社會愛戴的曾老師卻表示他是在妻子生病過世之後才決定走變性這條路，如果妻子還在，他大概不會做變性的決定，怕衝突太大會影響關係。

我常想，婚姻平權的倡議對於跨性別者與配偶之間處理身體、慾望、裝扮、形象和關係上的各種卡關與不協調有什麼實質的助益嗎？（「卡關」的意思是卡在某個環節破不了關）

2015年下半年，新聞前後報導了兩起英國跨性別的刑事案件，當事人女扮男裝，多次用假陽具跟女性做愛，後來被發現是女性身份時，對方就非常生氣提告性侵，其中一位還被判了數年徒刑，有新聞說8年、有新聞說2年，反正他就是被判了性侵的徒刑。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英國大部分地區都已經通過同性婚姻法案，北愛爾蘭雖然沒有同婚法案但在法律上也有民事伴侶關係的保障。為什麼一個普遍接受LGBT平等人權的地區，還會因為性伴侶的性別超乎預期而大動肝火，而且法院也以性侵害之名將他定罪呢？

台灣的社會新聞中也不時出現「男子約砲遇到偽娘 驚嚇落跑」的驚悚事件，2014年的新聞就有。事實上，指責跨性別者欺騙或約砲驚嚇落跑的故事是我在跨性別社群中比較常聽見的真實狀況。對照另一邊婚姻平權的發展，我們從電視上伊莎貝爾喜餅廣告裡看到兩個老男同志互相整理衣領、親吻的

畫面，感受他們相伴30年真摯的情感，也從許多倡議同婚的故事裡聽到相伴二三十年卻得不到法律保障的遺憾。近年來尊重LGBT人權、接納差異的溫情宣導和政治正確的氣氛，讓丹麥女孩埃恩納少了很多自私欺騙的責難，但是，當我們為葛蕾塔的真情感動萬分時，有沒有警覺到跨性別的生命經驗在二元性別社會裡所產生的尖銳衝突並沒有真正被大眾面對，沈重的壓力反而悄悄地隨著同婚運動的浪潮，再度擠壓到伴侶之間，讓雙方用「真愛」來承受。

砲友之間不講真愛，因此強烈的情緒衝擊有空間可以爆發。跨性別真正面對的挑戰是「憤怒提告性侵」和「遇到偽娘驚嚇落跑」那種內在扭結的情感結構，要想辦法在關係中變化彼此的對待方式，婚姻權反而不重要（有哪個太太不覺得自己老公扮女妝很噁心呢！）。再說，「真愛」真的無敵嗎？如果大家都看懂異性戀愛廣告的虛幻，為何對同志愛情卻這麼全心擁抱？結婚一向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家子的事，需要面對更多期待，需要和更多人斡旋，「可不可以穿女裝出現在丈母娘面前？」「我扮演不了一個好媳婦的角色怎辦？」對跨性別而言，婚姻是困難重重，處處卡關的課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反對同志運動優先爭取婚姻權，也反對過度美化同婚。性別運動不能只看性別。

第二部分，我想談對於目前同志運動的想法。現在LGBT團體只針對性別、性傾向的相關事情發聲，先把複雜的事件定性成「性別問題」，接著就想用「性別立法」來解決原本那個複雜的問題。看起來主體好像被保障了，但實際上卻讓更邊緣的人有苦難言。（以下我描述的故事都經過當事人同意）

並不是所有跨性人用「性別友善或性別平等」就可以安放人生。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想把馬偕違法解雇案說清楚，現在終於有機會。馬偕案當事人周員有一次跟曾老師一起上談話性節目，他拼命想告訴大眾，並非人人都像曾老師那樣幸運，但是他怎麼講都只能繞在性別歧視這件事上談一種經驗差異，好像有人很幸運被接納，有人卻不幸身處在充滿壞人（歧視加害者）的地方。

我算是對周員有深一層的了解，他的困難處境不只有性別，更艱難的是他的階級。他的經濟狀況不佳，40歲前，馬偕是他第一份穩定的工作，周

員人緣欠佳（表達和溝通都不夠成熟圓滑），工作上較常犯錯，原本有好同事可以涵容他的弱點，但他這個同事因為能力好被調去寫程式。馬偕擴充設備卻不願意多雇用人，只是加重原有職員的工作量，周員就在資方「人力短缺」和「人事調度」下失去工作上和人際上勉強維持的平衡，跟同事關係越來越僵。後來跟上司提資遣，馬偕卻不想給資遣費，周員只好自力救濟，以怠工來平衡工作壓力，當然也就更引起主管和同事的憤怒。

對周員來說，他當時極度需要社會輿論的支持，這些複雜的真相在馬偕案爆發之後都是必須極力撇清的，否則在資本主義競爭逐利的邏輯下，根本不會被同情和理解，這時候網路上充滿批評的聲音說：「工作有好表現怎會被免職？一定是個人有問題！」周員的性別身份（MTF）看起來雖然是弱勢，但是在政治正確的性別友善氛圍裡反而成為扳回一城的利器。他在被免職的前四個月開始穿女裝，希望主管受不了而把他資遣（結果馬偕還是不願意付資遣費），周員搜集了被主管訓斥和糾正的完整證據，就這樣打贏了所有的官司，也獲得賠償。這是2011年的事，一直到2015年，條件好、沒有道德瑕疵的曾老師成為媒體寵兒，周員跟曾老師並列在一起的時候，他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性別「弱勢」？他的辛苦如果只講性別受歧視而不談階級，不談勞動條件日益限縮，又怎麼可能講得清楚呢？

另外，馬偕案也反映出「平權運動」的問題。大家重視周員的性別受歧視，但是卻對他勞工弱勢的位置無感，這讓我想到前陣子一位男明星祖雄說：「絕大部份同性戀與異性戀一樣，都只是希望與一個人手牽手一輩子在一起這樣簡單的幸福！把同性戀跟荒淫無度、愛亂搞連結在一起是刻意抹黑，只會加深大眾對同志的誤解」。祖雄說的這番話，現在大概會被批評切割性污名，但是婚姻平權的推動完全就是用這種邏輯在招喚大眾支持的。要不然，原本是多元成家三法案，為什麼逐漸切割掉大眾不容易接受的部分，只談跟異性戀一樣的同志婚姻呢？同運爭取平權往往都是踩在其他議題上推展的：「我們跨性別也是努力工作的好員工，職場上應該要獲得平等對待」，這句話一出來，立刻就把馬偕案周員所面對的勞動處境給踩下去，墊高了性別的重要性。

我另外一位女跨男的朋友—D先生，憂鬱和失眠從大學持續到現在，將近35歲了，學習能力比一般人低，睡眠又很依賴藥物，工作受挫，一年換數

個工作已經是常態。他常說對政治有嚮往，會去幫國民黨候選人助選，肖想當國民黨青工會會長，臉書上有一堆政商名流的合照和臉友。我以前總覺得他是想要一種看起來體面的位置，但後來才知道他申請殘障補助（中度憂鬱）和低收入補助都會請民代幫忙喬到最高額度，做變性手術也有政治人物會贊助他（或幫他搞急難救助金等等）。原來政治狂熱只是我片面的認知，一切竟然都跟他的生存息息相關。政治狂熱也是一種精神疾病，但一旦我們將他貼上標籤，我們其實看不到他真正的生活。

D先生說他因為學習慢，效率差，而無法靠工作表現贏得友誼和敬重，有幾個善意的同事想協助他找出工作困難的原因，D先生支吾其詞地告訴對方他變性的過去，設法藉著性別友善的氣氛為自己盤一些被體諒的空間，後來還是免不了被炒魷魚的命運，策略很快失效。租房子也是，他說不想租那種沒有公共空間的小套房，想分租有客廳有廚房的公寓，因為自己太孤單，希望生活上有朋友作伴。30歲以前室友年紀都比他大，被問起在哪高就時，他可以隨便掰自己正在準備國家考試，就把作息不定的生活交待過去。然而30歲之後，他的室友年紀都比他小，真的就是研究生，他很怕人問起他的工作狀況。不想做保全，是因為不希望那些高材生的室友看不起他（曾經有人跟他說：保全是退休的人在打發時間做的，年輕人做這個沒前途），他更焦慮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他該如何交朋友又同時能夠交代自己的人生故事？於是他又跟室友出櫃他變性的事，讓自己不至於被魯蛇的自卑給淹沒。

他在經濟不寬裕的時候買一台二手車，載朋友出遊，去Costco購物，跟認識的大陸朋友說，來台灣吃住都算他的。為了跟朋友維持互惠的關係（不想只拿別人的好處），結果給了一些超過自己能負擔的承諾，搞得自己更焦慮。我曾經無法理解為何他要這麼「不自量力、愛面子」，後來總算看懂，比起性別，貧窮的壓迫更大。然而，D先生還是想要存錢做陰莖重建手術。他回去找小時候虐待他的母親，探究自己為何會嚴重失眠；去報名理工科夜校課程，彌補他小時候因為成績低落而放棄理工科的心願（他期待自己是那種有專業技能、有學識、有一群好哥們的理工科男生），當然沒多久就放棄了；他去美國投靠親戚希望能闖出一片天（沒多久就跟親戚鬧翻回台）；總之，他做了很多旁人無法理解的決定，原因無他，都是為了找到治癒嚴重失眠，脫離領補助的生活，以便進入人生常軌的方法。

以前跨性別社群內總有人說「變性人只想融入社會成為一般人」，但是我們卻發現「隱藏」是有條件的人使用的生存策略，受到經濟、階級壓迫的底邊人不要說外貌了，整個生涯都不可能融入主流假裝跟大家都一樣，出櫃反而有一線生機。人身上的不平等是多重的，同志運動卻只聚焦在性別和性傾向上，一直往前衝，把人身上的其他的議題都切割出去。這種劃分運動領域的做法在分析和行動上很便利，但是卻很容易扭曲事情的全貌。

最後，我想說一個自己的小故事，也許可以讓大家看得更清楚。我第二任女友跟我交往半年之後寫了一封分手信給我，她說她想要過一般人的生活，結婚生子，不想再繼續跟我這種人交往。大家可以想見我收到這樣的分手信有多痛苦（她是知道我的跨性身份才跟我交往的，最後又用這種理由跟我分手！）我的情路坎坷，一路走來的挫敗都是因為性別的緣故，我多麼希望像一般人一樣正常，可以結婚生子成家立業，所以同婚運動對於像我這樣想進入主流人生常軌的性少數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不過，我現在要把這個故事說得更完整一些，我的第二任女友是醫學系的學姊，在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開始交往。她問過我要不要考學士後醫學系，希望我將來能夠有好的社經地位，這樣她比較容易說服家人和身邊的親友和教會接受我。我早年也被成就所困，像我這樣不男不女的人人生價值何在？我心想，如果沒有一番上得了檯面的事業和成就，可能這輩子都脫離不了被質疑羞辱的命運，所以大學重考了兩次，都沒有上我想要的「有前途的」科系。於是接受學姊的建議，我去報名了「學士後醫學系」的補習班，但是上了幾個月之後覺得跟不上進度，想放棄，就在決定放棄考後醫，去補習班退費之後一週，就收到學姊的分手信.....這才是比較完整的故事。

現在回想起來，學姊用性別的理由跟我分手，或許是對雙方都仁慈的說法。想進入婚姻，也意味著需要滿足很多幸福婚姻的條件，有房有車有事業，加上經濟無虞，這些可能比有一個正確的性別還重要。我想說的是，一個人身上的性／別苦難是複雜的，「性別至上」卻又窄化意義的同婚和平權運動，所撐出來的正義大傘很容易遮蔽掉其他更使人難堪痛苦的結構性因素。講完了，謝謝大家。

黃道明：謝謝旭寬精彩的回應，非常發人省思。以後騰稿出來我想要再讀一次，才能更理解旭寬表達的複雜性／別苦難。這是個需要時間消化一下

的故事。

Q&A

賴麗芳：我覺得一直以來，運動的修辭都是在「愛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差別」上面去主張，在其他議題上沒有任何耕耘。當你在愛上面做主張的時候，它會顯得同志婚姻對支持同志運動的人是可行的，因為兩個人相愛就結婚，你們兩個人的性在婚姻裡面維持得好，不要流出到外面影響到別人，這樣的 LGBT 友善就是可行的。可是這樣的主張又跟宗教右派主張的家庭健全沒有衝突，你的性和情愛都是在婚姻裡面得到維持，維護健全家庭的茁壯成長，兩者看起來對立但主張是疊合的。我覺得這個疊合造成的擠壓就會回到我之前看到的宗教右派在講跨性別廁所的問題，新聞也一直被護家盟轉貼，它在散播一種「害怕被跨性人士在廁所性侵」的恐慌。我認為同志運動操作的愛的修辭，一直沒有正確的解決跨性別運動裡面的那種對跨性人士的恐慌，因為你一直在講愛的修辭，事實上沒有辦法回應宗教人士的性侵恐慌，他就是把你當成危害社會、混亂根源的恐怖份子。

另外就是在青少年運動裡面，現在台灣兒少保護主義非常盛行，青少年的身體跟性被管制得非常緊。青少年缺乏的不是結婚的問題，而是他要有情慾的空間，如果你講結婚的議題，實際上只會限縮他們的空間，因為婚前性行為的禁忌只會更加強烈，納他要如何在同志婚姻的主張之下長出情慾空間？如果他的家庭本來就是破碎的呢？在這個狀況下，他就更加被歧視，被認為你的問題就來自於你的問題家庭。很多人會逃家，逃家的人在同婚運動裡面也得不到支持，逃家的問題有很多都要回到住屋問題，你怎麼把一個青少年綁在他的原生家庭，他只能掛在那邊生存，其他社會資源都沒有。如果社會上能主張某種運動，讓這些人可以暫時性地逃家，他有困難可以在這裡居住，且居住權是不需要房租的。現在在外面租房子都是需要你要有穩定工作才能租房子，可是對青少年來說，逃家的人可能沒有穩定工作，如何思考沒有穩定工作人的居住權，在運動裡面完

全沒有這種討論，這是我的回應。

另外補充，其實在住宅問題上，兩邊其實可以有一些對話。例如現在宗教團體長期都有在做逃家少年的安置和中途之家，他們其實也會關注到某些有問題的學生教會可以提供資源安置青少年，這是他們的思考。可是我覺得對很多青少年來說，例如以我自己來說，如果我青少年時期援交被抓到，我不希望被安置到那個機構，因為我對教會健全家庭的信仰沒有任何認同，因為那些機構就是以矯正你回到正途為主，你不需要被矯正的話，其實就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Kenyon（何春蕤翻譯）：在美國，無家可歸的青少年當中有 40% 自我認同為酷兒或是跨性別，所以住屋問題對 LGBT 和酷兒年輕人來講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可是跟台灣相似的是，安置無家可歸的青少年的空間基本上都是交給宗教團體經營的，這一類空間所進行的管理和監控也就可想而知。美國的研究數據還顯示，對 LGBT 年輕人而言，住屋與 HIV 感染息息相關，沒有好的住處是造成 HIV 感染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主流的平權運動談住屋都是談 LGBT 年輕人結婚以後要住哪，好像住屋就只跟結婚以後的生活狀態相關，而沒有去談逃家 LGBT 年輕人的需求，就算討論也是非常表面的對話。過去好多年都只有關注經濟正義的紐約酷兒團體會關注青少年或 HIV 陽性青少年的住屋問題。酷兒青少年往往在家裡住不下去，所以找到合適的住處就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了。

賴麗芳：那你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Kenyon：對我們這個沒有什麼資產、資金的 NGO，要如何推動青少年住屋議題？我們其實沒什麼選擇，因為沒有物質基礎真正去改變現實，我們只能創造人際網路，看看有沒有善心人士能讓年輕人暫住。不過收容未成年的青少年是一個很敏感很微妙的事情，在法律上也容易產生麻煩，特別是發生性關係的時候，那就會變成法律事件，所以特別需要謹慎。另一方面，我過去住在華盛頓 DC 的時候遇到一位逃家的青少年，是同志而且 HIV 陽性，他逃家之後就告訴收容他的人說，媽媽不喜歡他是同志，也無法忍受他是 HIV 陽性，所以他

被趕出家門。結果那個 NGO 收容他之後，媽媽隔了一段時日出現，說：「他是同志我很 OK，我也知道他是 HIV 陽性。我之所以對他不滿，是因為他不肯上學！」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青少年離家的理由有百百種，有時跟青少年溝通，他說出來的理由不見得是真正的理由，他有的時候也不見得是家裡活不下去，而就是不喜歡家裡，不喜歡被管，喜歡有自己的空間。在這種狀況下就可能有很多很微妙的狀況，因此青少年收容問題不是找個空間就那麼簡單地解決，我們要尊重他的自主自決，也要知道他離家的慾望有時並非因為父母對他不好。

吳靜如：我叫靜如，我是為移工工作的。我想知道，不走主流同志論述那一套，那要如何跟工會團體或移工團體討論這些在性別上的非主流立場？非主流同運要的這些東西，要如何得到工會或移工團體的支持？在台灣的限制是，工運團體不要說討論同志，連討論性別都很少，除了同工同酬一直喊但是到現在一直沒有完成以外，要怎麼去談同志？怎麼讓他們理解同志運動其實有非主流同志這塊？請問 Kenyon 的工作經驗上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Kenyon：在美國，主流 LGBT 團體和工會的關係其實很詭異，一方面有些工會內部已經設置了 LGBT 工作小組，會特別關注 LGBT 工人的勞動權益，但是另一方面，在例如經費最多、勢力最大的主流 LGBT 組織「人權戰線」裡，每年都會提出人權報告，表列出當年對 LGBT 最友善的企業排行，或是有對同志最友善政策的公司。可是看看這些表列出來的企業，你會發現它們都是在全球各地違反人權劣跡斑斑的跨國企業。這也就是說，這些跨國企業之所以在人權紀錄上得分高，只是因為他有一些 LGBT 友善的相關政策，譬如說廁所、育嬰、員工福利，而從地緣政治、美國政治的角度來看，它們和工人議題的關連性是很表面的。要工會和 LGBT 運動發生關連，需要一個結盟的架構，才能看到 LGBT 議題也是勞工的議題，另外也需要一個磨合的過程，例如在美國，是工會內部本身的同志先出來，把他們的議題在工會裡面提出，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耕耘，才使得工會裡

面開始有了一些 LGBT 意識。但是現在有些工會也在脫離 LGBT 戰線，因為它們發現主流 LGBT 組織常常是反勞工的，那就沒法並肩作戰了。

吳靜如：我是想問，剛剛提到有很多跨性或 LGBT 確實碰到勞雇問題、聘僱問題，那他們會怎麼樣處理這個議題的行動？譬如說，當然一開始是自己的團體做，但是怎麼去做連結？我想問他實際的經驗上有嘗試過這樣做嗎？怎麼做？

Kenyon：首先，工會組織裡的 LGBT 要先自己組織起來，例如找人聚在一起聊天談事，形成組織，要是你在工會裡認識一個 LGBT，他可能認識另外十個 LGBT，所以你可以把這些人組織起來，一起設計策略，改變工會裡處理性別、性傾向議題的方式，同時也影響工會，讓他們看到 LGBT 其實是很好的同盟軍。要利用你自己在工會內部的位置去帶動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或者邀請別人一起去參加活動，或者推動什麼政策。反正就是要在內部串連，我個人通常是這樣做組織工作：一般人在有行動時總是會邀請同樣的一批人參加，我則總是在注意誰沒參加，誰才是確實做事的人，我總是提議要不要邀請某某人參加。關係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有了共事的關係，就可以聯手改變我們所屬的工會，引進不一樣的政治操作。人們總是嘲笑我怎麼所有人都認得，但是我就是決心結識更多人，這樣一來，無論在哪裡有行動，我都會知道哪個城市、哪個國家有哪些人可以一起合作。說穿了，就是和人建立關係，一起用他們想出來的方法去改變自己所屬的建制，有了新的議程就可以擺出新的佈局。如果工會裡發生了某個歧視酷兒的案件，最好是當事人願意出面把事情講清楚。這種「出櫃」當然不容易，因為他們的處境可能不想被人知道身分，不想承受可能隨檢舉之而來的報復。如果他們願意出面，當然最好，要不然，如果我知道這件事，也認識工會裡的幹部，那我就會設法召集一個小會，至少讓幹部們聽聽當事人的說法，然後敦促工會積極處理。我媽常說，你主動請人採取行動，他們就得回復做或不做，第一次可能不成功，沒關係，搞不好，第三次

第四次第五次請他，他就有可能同意，但是你得積極的問。還有，LGBT 主體在職場上遭遇的歧視問題很廣，有時你得針對工會發動一個小型的抗爭運動，威脅他們要是不處理就會找媒體控訴工會漠視 LGBT 議題。所以說，對付體制，要軟硬兼施，先創造對話的機會，盡力找出共識的基礎，實在行不通時，也別客氣，採取直接的手段就是。

當然你可能遇到像旭寬講的馬偕事件的複雜狀態，也許當事人面對的真正困難不是來自於性別或性傾向，而是來自於一些生活上其他的弱勢狀況，這種情況和問題都是很複雜的。那麼遇到這種事情要怎麼處理？我只能說，跟青少年住屋議題一樣，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注意小心各種微妙的細節。

吳靜如：其實在運動層次上、個案層次上，我大概知道怎麼做，但是在運動層次上，工會有分主流跟非主流的做法，那麼在關係和串連上，要怎麼把一個非主流的 LGBT 運動和工運放在一起或是要怎麼想辦法分道揚鑣？具體說，Kenyon 的脈絡裡面都是在講非白人、弱勢的，我假設他常常會碰到勞工階級，甚至有移民勞工，這些族群議題跟主流工運有相關嗎？在美國的具體情況是怎麼樣？然後這支非主流 LGBT 運動時和工運有任何互動嗎？或者現在還沒有任何互動？

Kenyon：那要看情況。目前美國的同運和工運關係薄弱，一個原因是大部分美國工會只組織自己的會員，而工會的功能就只是幫助會員爭取最大利益，不是寬廣的組織勞工階級，這可以說是美國工會最大的失敗。這些年來，工會更弱，因為它無力組織工人。有些工人的行業沒有工會，或者他們所在的區域因為歷史原因（例如長期的奴隸制度），工會一向就比較弱，不過這幾年倒是有些有趣的發展，有些工會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新行動，還有一些組織雖然不是工會，卻也決定把那些沒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就算不能組工會，還是可以組織起來與資方集體談判很多議題。舉個例子，紐約有個團體叫做「零售行動計畫」，他們部份得到零售工會的支持，但是自己並不是工會組織，他們組織的對象是在 Uniqlo 或者 H&M 這種服裝店

工作的人，大家都知道，在這種店裡工作的人很大比例是酷兒跨性別。幾年前，這個組織來和我們 **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合作，因為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問題很大一部份是和酷兒跨性別的身分相關，但是他們組織的方式卻比較沒有繞著這些議題。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目前這種新的組織串連方式有時候是在工會之外進行酷兒跨性別勞動者的動員，偶爾也跟工會和某些事件串在一起。最近像 **Walmart** 或是麥當勞的罷工抗爭都是一些無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進行訴求，所以是不是絕對要跟工會有密切的關聯，也是看狀況、看條件。

王咻咻：想知道你們是怎麼賺錢獲得資金的？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我想說的是，在台灣這幾年很多資源都流往做同志婚姻運動的組織。在台灣，做法律運動的組織在這兩三年資本額多了一倍，然後台灣最大的同志運動組織「同志諮詢熱線」現在也有同樣的資本額，兩三年的時間就直接翻了一倍。之前我去參加一個多元成家友善論壇，這個活動辦在信義區誠品，就是台北地段最貴的地方，大概一個小時要 8000 塊場地租金，相比之下，在同志婚姻運動發展的這幾年，曾經是酷兒和同志運動發展場域的《破報》和《立報》都結束了，另外一個死掉的就是清大月涵堂，月涵堂可能是我們這些人都會去辦活動的一個場子，租金很便宜，空間比較好談話，可是 2014 年清華大學把它變賣出去。在這樣整個私有化、民營化的脈絡下，很多酷兒的討論、存在、立身的空間一個一個消失，權促會好像也瀕臨破產。不管是學術組織或是運動組織，看起來都很窮，要怎麼去解決自己組織的財政問題？沒有錢就做不下去，所以，組織要怎麼幫自己搞到錢才有辦法繼續做事情？

Kenyon：好問題。在這個困難的情況下，而且這不只是台灣或美國的困局，而是全球的形勢，我們到底要怎樣持續激進工作呢？目前的情況是，大部分資源都向著婚姻平權集中，這是一個很狹窄的單一議題，想要做其他議題或激進議題的團體卻越來越難生存。在美國，很多激進組織完全募不到足夠款項來做他們想要做的重要工作，他們努

力的議題沒能完全解決，議題也不斷在變化，最後只好關門。我知道我沒法回答你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資本一直在跨越國境，全球橫行，很多大型的國際組織，G20、WHA、WHO，都在重新定義疆界國界，拆除障礙，好讓資本更容易運行全球。面對這個大變化，作為激進份子的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又如何找到資金來維繫我們的運動？我也不知道答案。過去「酷兒經濟正義組織」做的工作串聯起很多不同領域、不同軸線，可是反而 LGBT 團體看不到這種複雜的視野，反而是另外一些激進運動組織提供了些許幫助。我們如何籌募資金？我沒有答案，我只知道很難。如果有答案，我就會告訴你們了。

聽眾 A：我看了 Kenyon 的三篇文章，它們很有趣地點出了酷兒和性少數或跟種族身分之間的矛盾或衝突。順著之前的演講思考問題，我在想，台灣的性少數的種族跟性別衝突比較沒有那麼明顯。你發現自己可能不是異性戀，你可能就會開始思考自己到底屬於哪個分類，如果定下來，你就會發現你選擇的這些 LGBT 背後可能都有很龐大的歷史，但是因為台灣的衝突比較不明顯，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把自己放進那個大歷史，彷彿自己就是那個曾經在石牆酒吧跟人打架、彷彿自己就是屬於那個被壓迫的創傷歷史群體。現在台灣婚姻平權狂飆，大多數人很奇妙，都會支持同婚。但是我覺得支持婚姻平權的團塊很面目模糊，如果你有除了性別身分以外的其他身分，就比較難被注意到，大家都不會注意到其他的東西。

王顥中：Kenyon 講到美國同志運動在全球擴散跟輸出的狀況，我蠻想再多聽一點，因為實際的狀況一定更複雜。從 1990 年代就會聽到這樣說，我們本地根本沒有同性戀，這都是西方來的東西，要求我們考慮本地國情。面對這個現實上同志運動確實從西方先進國家輸出而且影響到在地的議程，在地的團體要考慮怎麼樣面對這個趨勢。考慮是很複雜的，因為支持同性婚姻的團體也會自我辯駁，說他們有看到這個國際趨勢，但是他們必須借力使力。在中國大陸其實更明顯，國際資金進到中國大陸支持他們的團體，也影響了議程，在地團

體可能是全然拒絕，也有可能折衷，也有可能說自己是借力使力。我覺得主講人講了非洲南部的經驗，但還是想要多聽到一些其他的經驗，特別是主講人自己也是美國運動經驗的代表，美國同運的成功當中也有很多的挫敗經驗，比如說沒有看到種族。顯然美國內部也是有一些挫敗經驗的，那這些挫敗經驗跟輸出過程中在接受端的我們這些第三世界國家，被美國影響之後，本來的在地議程不見，本來的在地議程會跟 Kenyon 這種在美國內部挫敗的經驗接合在一起。我想聽聽，今天講到非洲南部，那有沒有一些其他類似看過的、複雜的在地團體考量？

曾浚赫：在美國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 Act 首先爭取失能者權利，爭取工作環境、public service、public accommodation 這些看起來比較有正當性的問題，我想問 Kenyon，過去有沒有處理過失能者同性戀的問題？在我看的資料裡面，他們都巧妙地避免談性，像 Amber 所說性是危險的，性很容易變成標靶。

Kenyon：先回應第一個問題，就是在地做其他酷兒工作的團體如何面對婚姻平權運動的擠壓，如何持續自己的工作。我想關鍵在於美國很多團體其實一直都維持著和其他議題的運動串連，像是針對警察暴力的許多酷兒和跨性別團體，都一直和拉丁裔、黑人團體合作在美國各大城市推動相關議題。就算婚姻平權的火車已經開出車站，這些本來就針對警察暴力發聲的團體還是繼續做著他們原來做的事。就捐款和資金的眼光來看，他們當然越來越難維繫，可是這些團體在警察暴力或移民議題上卻提出了很清晰的酷兒分析，也有很強的跨性別呈現，甚至超越專門做酷兒和跨性別議題的團體。這真的很棒。再說到美國失能運動的問題，同樣的也出現了主流框架的趨勢，他們關心的往往只是能否近用同情和各項服務設施而已，比較激進的失能正義運動裡面則有很多有趣的酷兒跨性別議題。其中一個失能和酷兒交織耕耘的議題就是愛滋運動一直在失能的議題上很活躍，1980 年代愛滋運動成功的把 HIV 和愛滋診斷寫進《美國失能法案》，所以 HIV 一直和失能的議題相連，現在人們仍然在 HIV 的脈

絡裡推動失能議題，而很多酷兒和跨性別也持續留在 HIV 運動裡。第二，我所知道的酷兒失能正義運動份子目前努力的工作，就是思考失能以哪些方式強迫人淪入孤立，以及失能的人如何被鼓勵、或者被強迫、或者被暴力脅迫不能有性、不能生育，這就是酷兒和跨性別在失能議題上的耕耘努力。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激進的失能運動份子會一方面說，是的，我們想要社會提供公共設施，讓失能人士能照顧自己、搭公車、或使用其他公共設施；但是同時，我們也批判這個世界如何製造了失能，例如透過環境惡化在全世界造成更多的天生缺陷，軍國主義和戰爭如何製造失能和殘障，或者食物的供應和飲食與糖尿病的關連如何形成更多失能的人群。我覺得我們真的活在一個不斷積極製造失能者的世界裡，所以我們思考失能議題的時候就不能只想公共設施而已。

黃道明：Kenyon 的分析非常精彩，點出了我們酷兒抗爭的左翼歷史如何從左轉向右，等於是同婚的前史，也點出同婚的價值又是如何透過美帝跟資本主義流轉到世界各地造成控制。我覺得旭寬的發言讓大家聽到一種感動跟震動，他回到人際的關係裡面去看這些權力，也就是 Kenyon 批判的權力架構裡面這些很細微的人際互動。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搞酷兒運動跟性別運動的人需要去專注的。今天謝謝大家的參加！

【逐字稿人員—陳思瑀】